

# 老妪无所依： 女性主义的年龄歧视成因分析

崔恩昊

摘要：女性主义对老年问题素来缺乏关注，老年女性不仅被女性主义运动视为异己，也无法借由女性主义理论思考生命困境，使女性主义几乎演变为一种年龄歧视主义。本文尝试从三个角度解读女性主义在理论及实践中长期忽视老年问题的原因：代际矛盾带来的沟通不畅、老年女性在文化表征系统内污名化形象的强大惯性和受到错误消费文化影响的老年女性群体的集体失语。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厌老情绪的解读，来重新建立女性主义与老年问题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女性主义 老年女性 年龄歧视 代际矛盾 污名化 集体失语

## 一、消失的老年女性

1970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老年》（*La Vieillesse*）一作的问世标志着老年问题首次进入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之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有辛西娅·里奇（Cynthia Rich）、芭芭拉·麦克唐纳德（Barbara MacDonald）、凯瑟琳·伍德沃德（Kathleen Woodward）、杰梅因·格里尔（Germaine Greer）、托尼·卡拉桑蒂（Toni Calasanti）、玛格丽特·古莱特（Margaret Gullette）、琳妮·西格尔（Lynne Segal）等女性主义学者开始陆续从文化理论和女性文学出发探索女性主义与老年问题的关系<sup>①</sup>，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主义对老年问题的关注在历史的任何节点都显得不足而游离。在波伏娃看来，对于老年问题，各界达成了一种“共谋的沉默”。这种沉默使得“社会把对（老年人的）虐待、诽谤、和悲剧的置若罔闻当成了一种通例”。<sup>②</sup>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女性主义开始逐渐认识到其参与主体的白人精英主义趋势，经过从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到佳亚特里·斯

① 主要代表成果有：Cynthia Rich & Barbara MacDonald, *Look Me in the Eye: Old Women, Aging and Ageism*, New York: Spinsters Ink Books, 1983; Kathleen Woodward, *Aging And Its Discontents: Freud And Other Fic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Germaine Greer, *The Change: Women, Ageing and the Menopause*, London: Penguin, 1992; Toni Calasanti, *Gender,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Aging*,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1; Margaret Gullette, *Aged By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Lynne Segal, *Out of Time: The Pleasures and the Perils of Ageing*, New York: Verso, 2014; 等等。

② Simone De Beauvoir, *Old Age*, Trans. by Patrick O'Bri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p. 243.

（基金项目）本文写作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合作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2016-12-06

〔作者简介〕崔恩昊，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与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文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二战后英国女性文学、性别理论及性别运动史。上海 200241

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从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到葛洛莉亚·安扎杜尔 (Gloria Anzaldua) 的努力, 女性主义的主体最终将半径延展到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之外的社会群体, 关注到少数族裔女性、女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的切身利益, 在提升了边缘群体社会能见度的同时, 也不断捍卫着她们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 最终将女性主义演变为包容着差异与多元文化的复数名词 “feminisms”。可疑的是, 在这个体现着女性主义参与主体多样性的复数词尾 “s” 里却难以发现老年女性的身影, 聆听老年女性对自身境遇的言说, 老年女性连同她们的身体、话语、空间一道消失。芭芭拉·麦克唐纳德曾断言, 从女性运动一开始, 你们 (年轻的女性主义者) 就把老年女性排除在姐妹情谊之外, 你们和男人一样看待老年女性, 我们的遭遇和问题都与你们无关。<sup>①</sup> 换言之, 女性主义者自身也无法被豁免 “共谋的沉默” 的罪名。假如横亘在 “女性主义” 和 “老年女性” 之间只是绵长的沉默的话, 那么二者之间尚存着对话的可能。然而, 这种沉默的状态正在被青年女性主义者所践行的一种可见的文化暴力所取代, 她们正一次次将老年女性推向 “他者之他者” 的位置, 阻断了她们为自身言说的渠道, 唯一的选择是在 “他者之他者” 的位置上继续沉默下去。

如果说, 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求得 “普遍性、一致和统一” 为己任的话,<sup>②</sup> 那么, 诞生于强调多元与差异的后现代理论背景之下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首先摒弃的便是对 “普遍性” 的追求, 而着眼于对身份的多元性和定义自身的困境的思考,<sup>③</sup> 然而对女性主义 “普遍性” 的放弃却为女性主义和老年女性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依据。第三次女性主义一个先在的特点便是带着 “年龄” 这个可堪玩味的标签降临, 这股发轫于 20 世纪末的思潮在定义参与主体时明确指出, 这一次浪潮的参与者 “出生于 1963 年至 1974 年之间”。<sup>④</sup> “青年一代” 成了第三次女性主义难以回避的关键词, 凯瑟琳·奥尔 (Catherine Orr) 指出, 第三次女性主义的重点就是组织年轻的女性主义者, 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核心。<sup>⑤</sup> 女性主义浪潮彰显年轻态的趋势本身不乏历史线性发展的合理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趋势的导引之下, 老年女性的隐身也在逐渐合法化, 年龄歧视成为女性主义面对老年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默许姿态。

## 二、女性主义年龄歧视的原因分析

卡拉桑蒂等认为女性主义虽然历来关注年龄, 但却忽视了老年和各年龄段女性之间的关系, 仅将关注点置于中青年女性和少女身上, 即便是在谈及老年女性时, 也倾向以 “中年” (middle age) 一言以蔽之。<sup>⑥</sup> 老年女性也因此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一片真空地带, 而女性主义研究对老年女性的忽视可能基于三方面的原因。

### (一) 代际矛盾: 两代女性主义者的对话受阻

女性主义将老年女性边缘化的最显性成因首先是一个历史交接的问题, 即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对前辈未能继续未竟事业的不满。毋庸置疑的是, 在女性主义的前两次浪潮中, 女性主义者的确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权利的保障和女性主义学科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 在女性主义

① Barbara McDonald, “Outside the Sisterhood: Ageism in Women’s Studies”, Jo Alexander and Debi Barrow (eds.), *Women and Aging: An Anthology By Women*, Corvallis: Calyx Books, 1986, p. 20.

②③ Barbara Arneil, *Politics and Feminism*,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188, p. 189.

④ Leslie Heywood and Jennifer Drake, “Introduction from Third Wave Agenda: Being Feminist, Doing Feminism”, Leslie Heywood (ed.), *The Women’s Movements Today: An Encyclopedia of Third-Wave Feminism Volume 2, Primary Document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6, p. 25.

⑤ Catherine M. Orr, “Charting the Currents of the Third Wave”, *Hypatia*, vol. 12, no. 3 (1997), p. 30.

⑥ Toni Calasanti, Kathleen M. Slevin and Neal King, “Ageism and Feminism: From ‘Et Cetera’ to Center”, *NWSA Journal*, vol. 18, no. 1 (2006), p. 14.

被学院体系容纳获得学术合法性的时候，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参与者们却从这里看到了新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认为，女性历史进入经院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弱化了女性主义的批判优势，斯科特同时援引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女性主义学术意义的评价，即“女性主义如果不去批判现有的大学范式，那它就得冒着成为大学这间蜂巢里的一个牢房的代价。”<sup>①</sup> 德里达的评价中的隐含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不加批判地选择进入象牙塔获取稳定的生活保障的同时，她们所践行的事业也随之成为学术体系的附庸。在年轻的第三次浪潮的参与者们看来，伴随女性主义研究学术地位合法化而来的是女性对男权话语所主导的经院体系的屈服，这恰是参与第三次浪潮的年轻女性主义者把年龄作为参与成员的构成要素写入纲领的原因。在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看来，前辈们尝试以大学为场域构建性别平等的改良路线是很难在男性至上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奏效的。前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校长尤兰达·摩西斯（Yolanda Moses）曾坦言，美国高等院校是尊崇“成就”（achievement）和“客观性”（objectivity）这样的男性价值的西方社会的产物，对“合作”（cooperation）、“联结”（connectedness）、主体性（subjectivity）这样的概念置若罔闻。<sup>②</sup> 当年轻一代需要重新定义女性主义运动参与主体这一历史任务的时候，她们富有针对性地排除了渐趋衰老的前辈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与身居象牙塔的学术女性主义划清界限。凯瑟琳·贝利（Cathryn Bailey）认为，在青年一代女性主义者看来，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犯下了“狂犬病般的身份政治”的罪行，仿佛是在把一条把协商一致的政党路线强加在每个人身上。<sup>③</sup> 不难看出，撕裂第二次浪潮的“政党路线”是第三次浪潮的结盟者们心照不宣的共同目标。同时，学术女性主义自身强烈的精英主义（elitism）特征，在第三次浪潮的参与者们看来缺乏足够的政治介入，特别是在北美性别研究领域烜赫一时的法国理论，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女性的生存现实和社会语境。简·科特霍伊（Jean Curthoy）认为当代法国女性主义的晦涩程度使得女性主义者切断了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只能从少数同行之中获得认可。<sup>④</sup> 无论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的阴性写作理论对女性文本中身体狂欢的宣扬，还是露丝·伊利加雷（Luce Irigaray）建立一套远离逻各斯中心的女性话语的尝试，都不能直面女性的政治诉求，也不能帮助女性主义理论成为有益的认识论工具。年轻的女性主义者选择贴近现实的纹理，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发声，摒弃第二次浪潮所倚重的文本的政治性与革命性。

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价值的部分否定，本质上源于新生代女性主义者对她们已经衰老的女性主义前辈们未能将女性主义运动所发挥的政治影响持续发酵的失望，同时也是对学术女性主义委身于经院体制内的不满。这种因时代差异而造就的矛盾，却使得女性主义运动将作为社会群体的老年女性视为异己排除于女性主义运动之外。一如卡拉桑蒂所言，老年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位置被忽视了。<sup>⑤</sup> 然而，通过对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历史的检阅，奥尔发现对老年女性的拒斥绝非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与生俱来的特征。1992年，上百名年轻的女性主义者聚集在纽约，组成了一个叫“第三次浪潮”的活动团体，这个团体所奉行的宗旨之一便是“来巩固年轻女性和老一辈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sup>⑥</sup>，只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第三次浪潮逐渐把关注半径缩小在青年女性之上，而忽视了在各年龄段女性主义者之间结盟的重要性。然而，在女性主义从政治运动向社会思潮的进化过程中，女性主义的参与主体向年轻女性的倾斜实际上只是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结果，而绝不是向老年女性紧闭大门的借口。

① Joan Wallach Scott, *The Fantasy of Feminist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8.

② Christina Hoff Sommers, *Who Stole Feminism: How Women Have Betrayed Wo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76.

③ Cathryn Bailey, "Unpacking the Mother/Daughter Baggage: Reassessing Second- and-Third-Wave Tensions",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s. 3/4 (2002), p. 139.

④ Jean Curthoy, *Feminist Amnesia: The Wake of Women's Lib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51.

⑤ Toni Calasanti, Kathleen M. Slevin and Neal King, "Ageism and Feminism: From 'Et Cetera' to Center", *NWSA Journal*, vol. 18, no. 1 (2006), p. 14.

⑥ Catherine M. Orr, "Charting the Currents of the Third Wave", *Hypatia*, vol. 12, no. 3 (1997), p. 30.

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全面体现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尽管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女性主义一度被诟病为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精英主义，用单个群体的经验去定义来自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背景的女性问题，斯皮瓦克便曾针对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中国女性》（*Des Chinoises, Des Femmes*）中的这种“症候式殖民主义慈善”进行批判。<sup>①</sup>然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女性不再需要进入大学便能感受到来自于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中女性主义的耳濡目染，波伏娃的著作不再是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而是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女性学者也不再视女性主义为禁脔，富有影响力的男性学者也饶有兴致地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来，例如，始终对女性主义保持关注并将其作为批判工具使用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女性主义愈发广泛的影响力使得女性在更早的年龄就开始萌发对性别问题和身份意识的思考。第三次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珍妮弗·鲍姆加德纳（Jennifer Baumgardner）认为，正是因为之前的女性主义的成功，它才成为这一代女性主义者（第三次浪潮）信手拈来的智慧，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女性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sup>②</sup>而这所有的一切得以发生，正是通过被年轻一代女性主义者所敌视的前辈女性主义者以及她们作为事业的学术女性主义的努力才得以实现。在21世纪初，单单在美国高校就有超过600个女性研究项目有资格授予从学士到博士的不同等级的学位，女性研究的影响也不断向全球辐射，但鲍姆加德纳也指出，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的所面临的时代与困境已经和第二次浪潮大大不同，她们也许可以分辨出马克思女性主义和自由女性主义的区别，却无法言明女性主义与她们的实际生活有何联系。<sup>③</sup>因而，年轻的女性主义者选择跳出学术话语以丰富女性主义的内容的同时，需要前辈女性主义者的帮助，来厘清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正视存在的问题，避免使女性主义落入空谈口号的窠臼之中。将年龄作为标签将老年女性排除在女性主义运动参与主体之外，只会让女性主义的力量不断折损。来自不同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应以对话的姿态参与到新的时代对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之中，消弭彼此之间的矛盾。作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亲历者，朱迪斯·纽顿（Judith Newton）坦言不同年代女性主义者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避免感情用事和话语倾向地思考，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女性主义者的社群（community）。<sup>④</sup>更为重要的是，老年女性作为社会群体，理应被纳入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之中，给予她们打破沉默、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

## （二）污名之力：医学话语对老年女性的污名化与女性主义者的非介入

女性主义年龄歧视的另一个重要形成原因在于女性主义者对老年女性在文化表征系统之中的负面形象的认同。在古代社会，迈入老年的男性、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并无过分的殊异。在某些地区，老年女性甚至在部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非洲南部的兰巴（Lemba）部落，老年女性可以打破年轻女性的禁忌，与部落中的男性共商大计，并且坐在更尊贵的右侧。<sup>⑤</sup>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使得老年女性退出生产环节而成为家庭的附庸。以14世纪中叶的英国为例，老年女性与子女之间达成一份供养协议，用牲口和土地来换取子女家中的一部分生活空间。<sup>⑥</sup>不再参与社会生产的老年女性开始被边缘化，公众对老年女性的反感态度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持续供养她们的不情愿。<sup>⑦</sup>因此，在中世纪文化表征系统之中，对老年女性的污名化现象开始显现。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老年女性通常是被讽刺或敌对的对象，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①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62 (1981), p. 161.

②③ Jennifer Baumgardner and Amy Richards, “The Number One Question about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vol. 29, no. 2 (2003), p. 450, p. 450.

④ Judith Newton, “Feminist Family Values; or, Growing Old — and Growing Up — with the Women’s Movement”, Devoney Looser and E. Ann Caplan (eds.), *Generations: Academic Feminists in Dialog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341.

⑤ Georges Minois, *History of Old A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Polity, 1989, p. 10.

⑥ Jennifer Ward, *Women in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ontinuum, 2006, p. 72.

⑦ Shulamith Shahar, *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Yael Lota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9.

Tales) 中的“巴斯妇”一篇里 (*The Wife of Bath*) 与年轻的主人公对抗的老丑婆 (loathly hag) 便是典例。

更为致命的是中世纪医学话语对老年女性群体的恶意进攻,这使得老年女性的污名化形象以一种被认可的形式嵌入到中世纪社会文化之中。当时的医学在谈到老年女性的身体时认为绝经之后的女性能够产生毒物。<sup>①</sup>更有极尽荒唐的言论认为,从医学的角度而言,绝经的老年女性仅仅通过触碰他人和恶毒的目光就足以造成损害。<sup>②</sup>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疯癫与文明》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中谈到,医生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达到治愈的目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天父和法官,家族和律法,他的治疗手段无异于是对古代的秩序、权威和惩罚等种种仪式的补充。<sup>③</sup>在福柯看来,话语 (discourse) 是构成我们认知现实的方式的主要系统,他认为必须要将话语视为我们施加在客体身上的一种暴力,正是这样的一种实践使得话语泛化为通例。医学话语由医生操纵并不断生成着新的医学知识,将暴力加诸老年女性之上,这些披着医学外衣的谬论纵然经不起推敲,但足以煽动公众和舆论对老年女性的敌对情绪。

为了能够摆脱医学话语所捏造的虚妄罪名,中世纪的老年女性利用一个假想的集体身份来抵御医学话语的诬陷:女巫。孤独而无助的老年女性经常会吹嘘拥有魔法,这是她们从社会中获得仅有的关注和尊重的唯一途径,<sup>④</sup>不仅如此,魔法与巫术甚至成了老年女性视若圭臬的信仰。用16世纪的荷兰术士约翰·怀尔 (John Weyer) 的话来说“相信女巫术 (witchcraft) 存在的人都是些又傻又疯的老女人。”<sup>⑤</sup>中世纪老年女性对“女巫”这一身份的选择并非偶然。对于已经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老年女性而言,她们急切地需要一个稳定的身份来增加政治上的能见度,来规避霸权话语对其的错误表征。福柯认为,人类只能通过强加于我们思考方式之上的话语来认识和体验实在客体和整个世界。<sup>⑥</sup>中世纪医学话语塑造着她们“有毒的身体”,文学作品将她们视为讽刺讪笑的对象,话语这个在福柯看来无所不在的系统为她们负面的形象在文化表征系统之中的建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公众也只能被迫通过霸权的话语认识老年女性。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 则更进一步,将话语看做用来指代或建构关于某个特定话题的知识的方式,它能够带来一系列的思想、图像和实践,来提供针对某个特定话题的谈论方式、知识结构和相应的行为方式。<sup>⑦</sup>而就老年女性这一群体而言,在话语上拥有绝对霸权的男性医生和作家控制着医学界与文学界对于老年女性的话语构成,如霍尔预见的那样,这些话语建立起的老年女性的负面形象进一步构成一个封闭的文化表征系统,不断生产着新的“疯婆子”和“有毒的老妇人”。要在这写满文化暴力的话语中求生,老年女性的回击便是构建属于她们的集体身份——女巫,来消弭男性霸权话语所带来的阵痛。在神秘主义蔚然成风的中世纪,特别是低地国家的伯格音运动<sup>⑧</sup>给了宗教妇女借由写作对抗男性把持的陈腐教会的可能,让女性认识到男性所构建的

① Shulamith Shahar, *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Yael Lota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44.

② L. A. Botelho, “Old Age and Women”, Diana Robin, Anne R. Larsen and Carole Levin (eds.), *Encyclopedia of Women in the Renaissance: Italy, France and England*,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7, p. 286.

③ Barry Smart, *Michel Foucault*,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6.

④⑤ Shulamith Shahar, *The Fourth G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Chaya Calai,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276, p. 280.

⑥ Sara Mills, *Critical Thinkers: Michel Foucault*,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56.

⑦ 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 6.

⑧ 伯格音运动是中世纪晚期发生在欧洲低地国家的一场以虔诚的妇女为参与主体的宗教运动,其特殊之处在于这些世俗妇女终身笃信宗教但并不加入修道院成为修女,而选择在世俗社会中从事酬劳微薄的体力劳动自食其力。这场运动同时激发了一批勇敢的以写作为工具挑战教会的女性作家,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波雷特 (约1250-1310) 和她的杰作《简单灵魂之境》 (*Le Miroir des Simples*), 波雷特因其异端言论在巴黎被施以火刑。可参阅杜力的《欧洲中世纪晚期女性作家研究》(2012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及李建军的《试析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伯格音运动》(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话语系统并非无懈可击。老年女性开始尝试对女巫形象进行光复行动 (reclamation)。<sup>①</sup> 对老年女性而言, 只有收复这个污蔑性的称谓, 才得以止损, 建立以为女巫形象平反为中心的话语系统, 才能够回击暗中为害的中世纪男性霸权。然而, 在话语系统之间的对抗中, 女巫最终败给了庸医。专门从事女巫史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艾莉森·罗兰 (Alison Rowland) 认为, 老年女性即便能以女巫的身份收获好的名声并存活下去, 也不代表她可以逃过猎巫运动 (witch-hunting) 的审判, 因为即使老年女性能以女巫的身份生存下去, 对她的命运做最终定夺的仍将是她所身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这一特定社会所体现的信仰与认知。<sup>②</sup> 1486年, 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一本名为《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 的小书大获成功, 正是在这本书里, 代表异端的巫术和女性第一次建立起联系。<sup>③</sup> 在此后长达近三百年的猎巫运动中, 老年女性成了最主要的迫害对象, 关于女巫的约定俗成的形象就是老年女性。在欧洲猎巫运动时期, 大多数被指责为拥有巫术的人实则都为老年女性,<sup>④</sup> 猎巫运动的范围从欧洲波及到殖民时期的北美, 在迫害了无数老年女性的同时也让老年女性的污名化形象成为文化表征系统中的范式。“老巫婆”成为投射在老年女性身上的一个具体的形象, 这一形象的渗透力度跨越了地缘的疆界,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表征系统中都得以复现。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认为, 背负污名之人在我们看来不再是人, 这也是我们能够对污名之人进行歧视的最关键假设, 这个假设不断减弱着污名之人的生存机会。<sup>⑤</sup> 污名之力不断蚕食着老年女性的主体性, 将她们降为非人 (non-human) 的存在, 几乎是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所辩称的“赤裸生命” (homo sacer) 的一种现代演绎: 一个被诅咒的人, 一个可以被杀死而施害者不受法律制裁的人。

借由对史料的爬梳, 以中世纪医学话语为例来重现老年女性形象的被污名化历程, 旨在为现时的一种可与中世纪类比的、针对老年女性的厌老文化的形成提供一种解释。“老巫婆”作为一种污名化的形象, 俨然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能指。这一能指在不断锐化老年女性的边缘性, 制造着对于衰老的惶恐情绪和厌弃态度。同时, 这种能指也参与构建着一种厌老的意识形态 (ideology of gerascophobia)。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 意识形态是一套用以体现统治阶级的思想, 特定意识形态系统之内形成与之呼应的文化与艺术。特里·伊格尔顿就认为, 任何艺术作品都脱胎于对世界的意识形态认识。<sup>⑥</sup>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改写要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在他看来, 意识形态本身已经构成一套完整的表征系统, 它包含形象、概念和强制推行的结构, 这套表征系统进一步内化的结果是人们对意识形态系统之内所生成的任何假设失去了质疑能力, 只剩下自觉地认可。<sup>⑦</sup>

阿尔都塞的观点言明了崇尚年轻化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失败之处。她们不仅没有为老年女性发声批判这种意识形态, 反而成了参与构建厌老意识形态的同谋者。与阿尔都塞的诊断如出一辙, 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对“老巫婆”这个被虚妄的假设所撑起的形象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 “老巫婆”的隐喻更成了她们身份危机的一个映像, 因而在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看来, 逃离“老巫婆”这个形象的强大惯性并展现女性的青春活力便成了要务。贝利指出, 身体美学和性感这些并不被前辈女性主义

① 光复 (reclamation) 或再挪用 (reappropriation) 在社会学或文化研究中指被污名化群体将指代自身的污名化称谓演变为正面积极的集体身份标签的文化过程。典型例子为 19 世纪末以污名化称谓出现的“酷儿” (queer) 一词, 逐步演变为 LGBT 群体的身份标签。

② Alison Rowlands, “Witchcraft and Old Wome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ast & Present*, no. 173 (2001), p. 88.

③ Jean Michel Sallmann, “Witches”, in Natalie Zemon Davis and Arlette Farge (ed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Volume 2):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46.

④ Michael D. Bailey,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itchcraft*, Lanham: The Scarecrow Press, 2003, pp. 5-6.

⑤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Hall, 1963, p. 5.

⑥ Terry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5.

⑦ Luke Ferretter, *Louis Althusse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77.

者认同的价值在年轻女性主义者之中变得愈发显著，第三次浪潮要将美丽、性别权利和阴性气质重新估价。<sup>①</sup> 这一观点背后的隐性原因正是因为身在厌老意识形态之下的青年女性无法正视衰老，轻易地臣服于年轻/衰老的二元对立之下，走到了老年女性的对立面。女性主义运动也因此将代表着女性负面形象的老年女性排除在外，唯恐老年女性的存在会削弱女性主义运动的力量。

### （三）集体失语：老年女性的沉默

在女性主义代际矛盾和污名化的老年女性形象的阴霾之下，使女性主义忽视老年问题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老年女性自身并没有选择主动发声，而将沉默延续下去。对于衰老，法国社会学家大卫·勒布雷东（David Le Breton）的评价颇为耐人寻味“我们慢慢走向死亡，却始终感觉青春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长，感觉老人是另一个星球的事……在生命当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都是指别人。”<sup>②</sup> 在勒布雷东看来，人类始终把衰老视为一种他者。从这个角度看，老年女性针对群体所遭遇的文化暴力所采取的沉默恐怕并非一种自觉的行为，这种沉默本身意味着老年女性对“老年”这一修饰词的回避，因而沉默的姿态可以被看作是老年女性对一种模式化身份的拒绝认同。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将年轻女性的青春与身体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定义性特征，青年女性主义者通过使用比较级“较为年长”（older）而非原形“old”来刻意回避后者所隐含的消极信息。<sup>③</sup> 与此同时，老年女性连带她们的身体也几乎从文化语境中隐身，北美学界最早关注老龄问题之一的学者凯瑟琳·伍德沃德（Kathleen Woodward）曾感叹道，无论在学术或艺术领域，身体都早已成为关注焦点，而老年女性身体的重要性只能用它的缺席来体现。<sup>④</sup> 消费文化在不断通过宣扬衰老之恐惧来提醒老年女性身体的可变性，借由美容手术、化妆品、时尚服饰等技术手段使青春永驻，对年轻实施一种模仿，而老年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神话。迈克尔·菲泽斯通（Michael Featherstone）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带来的新兴科技也带来了消费方式的剧变，青年不断被理想化，使色情化的年轻女性身体成为消费文化中的一个普世化形象。<sup>⑤</sup> 在错误的消费文化的带动之下，老年女性无法以辩证的方式直面衰老的过程，不断通过模仿消费文化中一个虚构的形象来实现自我认同。但老年女性必须认识到，模仿并不能带来可见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对于模仿者而言，原型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终点，她们终究无法弥合与年轻女性之间的沟壑，也在模仿中完全丧失了个人对身体的控制，听命于由男性霸权话语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在第二次女性浪潮中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迈向古稀之年的时刻，仍然很难听到对衰老的自省和对老年女性的利益进行捍卫的声音，她们似乎满足于在这种沉默中被误解的文化所消费。

因而，长期以来年龄歧视主义一直缠绕着女性主义研究，令老年女性陷入长久的沉默之中。19世纪70年代以降，女性主义者对衰老问题的反思一直以零星的方式浮现，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陆续有更多的论述问世。在对衰老问题的思考上，波伏娃再次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面。1963年，波伏娃在她的第三卷回忆录《时势的力量》（*La Force des choses*）中表达了她对日益匮乏的精力和渐渐来临的死亡的担忧，而1970年的《老年》则是对衰老问题进行女性主义思考的开山之作。波伏娃从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角度，全面剖析衰老这一伴随人类文明产生的现象。在波伏娃看来，成长、成熟、衰老、死亡是现在的人类命运，让老年不至于成为过往人生的戏仿的唯一方法是去追逐一

① Cathryn Bailey, “Unpacking the Mother/Daughter Baggage: Reassessing Second- and-Third-Wave Tensions”,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s. 3/4 (2002), p. 145.

② 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媛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11-221页。

③ Toni Calasanti and Kathleen F. Slevin, “Introduction”, in Toni Calasanti and Kathleen F. Slevin (eds.), *Age Matters: Realigning Feminist Thinking*,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3.

④ Kathleen Woodward, “Performing Age, Performing Gender”, *NWSA Journal*, vol. 18, no. 1 (2006), p. 162.

⑤ Michael Featherstone,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Featherstone and Andrew Wernick (eds.), *Images of Agei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Later Lif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6.

个赋予我们存在意义的目标，<sup>①</sup> 而社会针对衰老的“共谋的沉默”只会暴露我们整个文明的失败。<sup>②</sup> 尽管有学者如托里尔·莫伊（Toril Moi）认为波伏娃对老年的思索是用一种“移位战略”（strategy of displacement）来阻止对于空虚和失去爱的恐惧的省察，<sup>③</sup> 但这完全不能遮掩《老年》的伟大之处，波伏娃基于自身经历对老年问题的思考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70年代初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反潮流之举，而她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广度涉及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不同的视角解构漠视衰老这一行为背后的文化构成。在北美学界，女性主义者对老年问题的思考则要迟一些。1983年，辛西娅·里奇（Cynthia Rich）与芭芭拉·麦克唐纳德合著的《看着我的眼睛：老年女性、衰老与年龄歧视》（*Look Me in the Eye: Old Women, Aging and Ageism*）第一次将年龄问题引入北美女性主义研究的视域之中。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两位作者大量使用第一手的个人经验向读者展示衰老对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和其中的意义，其目的不仅在于要帮助老年女性驱散文化上的“不可见”状态，还在于对青年女性的引导作用，来唤起她们对老年问题的重视。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像她们预见的一样。三十年之后，辛西娅·里奇在采访中谈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异常活跃的女性主义者都逐渐进入老年，但她们仍然没有显出任何意向去建立一个思考衰老的理论框架，使得一代代人在面对衰老时仍感到茫然若失。<sup>④</sup> 或许在这个时代，老年女性依然在等待第二次浪潮中的参与者中能有敢为人先的勇士，打开冰封已久的沉默来直面老年问题。

### 三、结语

无论是作为政治实践还是进行学术研究，恰当地处理与老年女性的关系的确是当下女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一环。在消费社会对青春的鼓吹之下，青年女性主义者对老年女性和老年问题的漠视态度逐步加剧，女性主义对差异与多元的追求渐渐迷失在其对老年问题的回避和甚嚣尘上的年龄歧视主义之中。贝尔·胡克斯在评价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格格不入时曾批评后现代主义表面力主异质性和去中心化主体，但实际上只是面对极少的受众用后现代主义致力推翻的全知叙事自说自话。<sup>⑤</sup> 胡克斯的这段评价对于女性主义和老年女性而言也是切中肯綮的。女性主义运动对老年问题的拒斥姿态在违背了这场运动初衷的同时，也让它走向主导青年的功利主义深渊。因而，女性主义亟需解决的问题是遵循辛西娅·里奇的建议，去引导年轻女性在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之下思考老年问题，让后来者在面对老年问题时不至于无所适从。同时，青年女性需要建立合适的平台来与老年女性对话，将一代人的智慧运用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之中。

（责任编辑：邝彩云）

①② Simone De Beauvoir, *Old Age*, Trans. by Patrick O'Bri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p. 601, p. 603.

③ Toril Moi, *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 Oxford: Blackwell, 1994, p. 242.

④ Valerie Barnes Lipscomb, "We Need a Theoretical Base: Cynthia Rich, Women's Studies and Ageism", *NWSA Journal*, vol. 18, no. 1 (2006), p. 4.

⑤ Rita Felski, *Doing Time: Feminist Theory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